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

张 钟 洪子诚 余树森 赵祖谟 汪景寿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书 名:中国当代文学

著作责任者:张 钟 洪子诚 余树森 赵祖谟 汪景寿

标准书号:ISBN 7-301-00085-5/ I · 037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 1168 32 开本 10.875 印张 35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二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6.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诗歌创作	(10)
第一节 概 述	(10)
第二节 艾青、田间的诗歌创作	(21)
第三节 李季、闻捷的诗歌创作	(28)
第四节 李瑛、公刘的诗歌创作	(35)
第五节 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44)
第六节 复出的诗人	(53)
第七节 舒婷、北岛等的诗歌创作	(66)
第二章 散文与报告文学创作	(77)
第一节 概 述	(77)
第二节 魏巍、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及散文	(85)
第三节 杨朔、秦牧、吴伯箫的散文	(94)
第四节 巴金、冰心的散文	(106)
第五节 徐迟、黄钢、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115)
第三章 话剧创作	(128)
第一节 概 述	(128)
第二节 《霓虹灯下的哨兵》与“十七年”时期的 话剧创作	(135)
第三节 老舍《茶馆》与京华风俗戏	(142)

第四节	《蔡文姬》、《关汉卿》与历史剧创作	(154)
第五节	历史杰出人物的颂歌	(162)
第六节	《血,总是热的》和改革题材的戏剧创作	(170)
第四章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	(179)
第一节	概 述	(179)
第二节	革命斗争题材的短篇小说	(190)
第三节	赵树理与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	(198)
第四节	五十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	(209)
第五节	风格多样化与茹志鹃的创作	(216)
第六节	《保卫延安》与建国初期的长篇小说	(221)
第七节	《山乡巨变》与《创业史》	(227)
第八节	《青春之歌》与《红旗谱》	(237)
第九节	《红日》与《红岩》	(248)
第五章	新时期的小说	(259)
第一节	概 述	(259)
第二节	文学的解放与王蒙的小说创新	(266)
第三节	农民命运曲与高晓声的小说	(272)
第四节	苦难历程上的跋涉者——张贤亮的小说	(279)
第五节	工业与城市生活的变奏曲	(284)
第六节	军旅文学的新拓展	(294)
第七节	张洁、谌容、宗璞的小说创作	(302)
第八节	崛起的青年作家群	(310)
第九节	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	(319)
第十节	长篇历史小说的丰收	(326)
后 记		(341)

绪 论

当代文学的性质与特征

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进入到当代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它直接继承和发展了现代文学的革命传统(也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但与现代文学在性质与任务上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国当代文学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要求、愿望和时代精神风貌,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有着明确的服务方向。在 1949 年 7 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以来一直遵循这一方向,直至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前一个口号。这两个口号在实质内容上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后一个口号更符合新时期社会变化的形

势,也可避免过去在执行过程中发生过的把文艺服务对象狭窄化的偏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它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以及面对广大的文学服务对象的多层次的需要方面,都为文艺工作者敞开了广阔的选择的天地,而且也只有使文学艺术充分繁荣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既是当代文学,当代性就是它不同于既往的历史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现实的运动同步而行,与当代人的精神情感同感共鸣。当代文学作为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最积极最活跃地表现着当代社会的运动过程和精神思想,因此,它的社会作用常常具有直接的效果。从当代文学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精神的强力搏动和对社会问题的敏锐省察。比如,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批“干预生活”的小说、戏剧、诗歌和主张“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品,80年代出现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浪潮,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当代性不仅表现为文学在选取当代题材上,而且还表现为作家以当代观念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上,这使得当代文学常常充当当代思潮的先锋,引起社会注目。

社会主义文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文学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在一个封闭体系中创建自己的文学。恰恰相反,一方面,它与本国度本民族的文学有着直接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对世界文学中的积极成果有着吸取和交融的关系。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人类进步文化采取开放态度,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十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我国当代文学以积极的姿态面对世界文学的优良创作经验,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现实,对促进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创造具有自己独立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与开放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选择的广采博取为我所用,是具有强大生

命力的表现。同时,开放是双向的,从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来看,它也是面向全世界的。

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与各时期的主要特点

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端的当代文学的历史,至今经历了近四十个年头,它的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十七年”时期——1949 年全国解放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

“十七年”时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建和发展阶段。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文学道路并不平坦。建国之初,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蓬勃向上的生活气象,唤起各类作家创作的激情,歌颂新生活,缅怀革命史,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小说方面,有《登记》(赵树理)、《新事新办》(谷峪)、《村歌》、《风云初记》(孙犁)、《不能走那条路》(李准)、《三里湾》(赵树理)、《活人塘》(陈登科)、《铜墙铁壁》(柳青)、《保卫延安》(杜鹏程)等作品问世。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以新旧社会对比的形式歌颂了北京的新生,受到普遍的好评。《万水千山》(陈其通)、《明朗的天》(曹禺)等话剧创作也有代表性。诗歌方面,《新华颂》(郭沫若)、《放声歌唱》(贺敬之)、《致青年公民》(郭小川),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产生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等散文、报告文学轰动一时。

随着社会主义进程的深入发展,50 年代中后期,一批表现社会深刻变革和揭示社会生活中的新矛盾的作品相继问世。《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在和平的日

子里》(杜鹏程)、《百炼成钢》(艾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等可作为代表。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创作,取得颇为可喜的丰收。《青春之歌》(杨沫)、《林海雪原》(曲波)、《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战斗的青春》(雪克)、《苦菜花》(冯德英)、《红旗谱》(梁斌)、《三家巷》(欧阳山)等和稍后出现的小说《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老舍),这些作品的涌现标志着“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的高潮。长诗则有《杨高传》(李季)、《赶车传》(田间)、《复仇的火焰》(闻捷)及诗人郭小川的诗歌和此后出现的长诗《雷锋之歌》(贺敬之)问世。历史剧的创作使得老作家大显身手。有《茶馆》(老舍)、《蔡文姬》、《武则天》(郭沫若)、《关汉卿》、《文成公主》(田汉)和稍后出现的《胆剑篇》(曹禺)。这期间,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作家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1957年所发生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错误,批判一批“干预生活”的作者和作品,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958年的“大跃进”和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使文学创作产生一些浮夸、矫情、夸大现实阶级斗争实际状况的作品。但一些有识之士则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如老作家赵树理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1962年前后,虽然经过周恩来、陈毅等人的努力,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但很快又在极“左”路线的冲击下,文艺界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整风,直至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风潮席卷全国,形势愈趋严峻,“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历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袭来,便告结束。

就“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来看,它的特点可总括为:

文学富有革命激情和鲜明的社会政治性。面对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的社会现实,激发了作家们的高度的政治热情,直接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注目重大的现实社会题材,追寻现代历史上重

大事件和革命过程,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色。“十七年”时期的当代文学作品,可以构成一部中国近百年社会革命的编年史和当代社会政治运动史。《六十年的变迁》展现了从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一代风流》着意表现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红旗谱》、《播火记》谱写出中国农民觉醒奋斗的历史道路,《杨高传》、《赶车传》把民主革命时代与社会主义时代联系起来表现。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品,例如从《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到《山乡巨变》、《创业史》,表现了一代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历史跋涉。多卷本的《上海的早晨》再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的运动过程。同时,“十七年”时期由于不适当地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路线,致使一些作家不停地赶写配合政治运动、政策和中心任务的作品,存在图解政治、政策概念的倾向,即使在一些质量较好的作品上,也打有不同程度的图解政治的烙印。

文学把创造英雄形象放在人物塑造的首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在气质上是以历史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学史上,追求文学的史诗性效果,即表现大的历史过程和对革命英雄的赞颂,必然把英雄人物放在创作的中心地位。文学中出现的诸如石得富(《铜墙铁壁》)、周大勇(《保卫延安》)、杨子荣(《林海雪原》)、朱老忠(《红旗谱》)、林道静(《青春之歌》)、江姐、许云峰(《红岩》)、梁生宝(《创业史》)、李双双(《李双双小传》)、雷锋(《雷锋之歌》)等正面英雄人物形象,代表这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时代气质。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若干文学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同时,由于过于强调理想主义的主导作用和对表现人物阶级本质的要求,致使文学创作中出现对英雄人物理想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较普遍的存在把社会阶级分析的理论结论当作人物描写的现成规范的现象,在表现人物关系上基本上不超出按照阶级地位的分类去写各种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状况,存在着人物塑造类型化、单纯化的弊端。

开始显示出多种风格的形成。“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一批独

具风格的作家作品,如赵树理、周立波、老舍、孙犁、柳青、梁斌、茹志鹃、李准、郭小川、贺敬之、秦牧、杨朔等。但是,由于强调文学观念与创作方法的统一和一律,限制了作家创作个性的发挥和探索的可能性,影响了多种风格和不同流派的竞赛与文学的繁荣。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至1976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代文学首当其冲地遭到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的疯狂扫荡。在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诬蔑“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是“修正主义黑线”,一棍子打倒,大批文艺工作者和作家被无情打击,倍遭摧残,文艺战线一片黑暗恐怖气氛,文艺园地一片破败凋零景象。

林彪、“四人帮”一伙一方面对文艺界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止广大作家的创作活动,一方面利用他们把持的八个“样板戏”当作推行他们政治路线的手段,诱迫少数文艺工作者按照他们的政治要求进行写作,如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长诗《西沙之战》、电影《反击》等,就是作为图解、宣传他们的政治意图而出现的拙劣不堪的作品。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上的另一状况是,在极“左”政治路线和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的狂热鼓噪下,使得有些创作走上歧途,带有浓重的极“左”思潮的味道。另有一些作家在高压的政治气候下进行艰难的创作,出现了《闪闪的红星》(李心田)、《大刀记》(郭澄清)、《万山红遍》(黎汝清)、《昨天的战争》(孟伟哉)、《春潮急》(克非)等作品。至于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在地下秘密流传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张扬)、《公开的情节》(靳凡)则伸张了正义,从政治上公然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共鸣。1976年4月,千百万群众怀着对“四人帮”的极大愤慨喷涌而出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表达了人民怒不可遏的正义呼声,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天安门诗歌运动

是当代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是这一时期文学史最可记述的壮丽一章。

三、新时期文学——1977 年至今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以来,在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指导下,我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文艺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进行了拨乱反正,使得文艺从极“左”路线的种种禁锢中解放出来,出现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新的创作高潮,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好的时期。

新时期文学的特点,表现在:

多种文学潮流交错或并行出现。“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最先出现的创作潮流。“文革”结束之后,首先面对的是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人民和国家的沉重伤痛,这是“伤痕文学”产生的直接的社会原因。“伤痕文学”的内容包括:对“四人帮”罪行的揭露和提出令人警醒的社会问题的作品,如《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我该怎么办》(陈国凯)、《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蹉跎岁月》(叶辛)、《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等。有对美好情操的赞颂和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的作品,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土牢情话》(张贤亮)、《灵与肉》(张贤亮)等。有歌颂面对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如《将军吟》(莫应丰)、《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话剧《丹心谱》(苏叔阳)等。

“反思文学”的出现略晚于“伤痕文学”,它在社会内容上比之“伤痕文学”扩展和深化了,它把反映的社会内容向前推移至 50 年代以来,对我国三十余年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进行反顾思考。《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谌容)、《李顺大造屋》(高晓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芙蓉镇》(古华)、《绿化树》(张贤亮)等作品可以作为代表。这些作品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道

路的曲折过程联系起来,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改革文学”即以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题材的作品,这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还在“四人帮”粉碎不久,这股文学潮流就已兴起,它是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这是因为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端和不能忍受的落后状况,已使人们在反思的同时迫切要求实行改革。最先出现的《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蒋子龙的系列改革题材小说如《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都切进经济政治问题,反映出改革的迫切性。《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新星》(柯云路)等作品的涌现,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性成果。这一文学势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将会继续兴旺发达。

近年出现的“寻根文学”、“乡土文学”、“探索文学”、“纪实文学”和崛起派诗歌等等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文学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今后新的文学潮流还会不断交替出现,起伏更迭。

文学主题的开阔与深化。新时期的文学主题具有多向性的特点,突破了以前时期当代文学主题单调(比较单一地集中于公与私对立冲突的主题范围之内)的局限。新时期的文学视角广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爱情、风俗民情、民族心理、自然景物等等,皆成了文学主题,使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大了。多向的主题又都联系着现实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精神,社会主题是多向的集中点,这与中国文学具有突出的社会性的传统相联系。与主题扩展的同时是主题的深化。一方面,是对社会历史深层内容的深化。比如,对社会内在矛盾的揭示,过去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多表现农民的私有观念与公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忽视农民的合理需求,这一时期的作品则多从农民的合理要求与极“左”路线的矛盾中揭示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对人物关系的表现也打破了囿于旧有阶级关系的模式,从新的已经变化了的关系和矛盾出发,反映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长篇小说《芙蓉镇》通过一个乡村小镇的政治风云,写出了人物关系与人物

命运在政治风云中的交错复杂的变化与生活变迁。另有一些作品则从现代生活潮流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交叉点上,表现当代人的新的心理矛盾与精神焦虑,如《人生》(路遥)、《老井》(郑义)、《髻毛》(陈建功)、《车站》(高行健)等作品所展示的主题。一些“寻根文学”深化到传统文化积淀造成的民族心理积习的主题上,展示民族前进脚步过重的负担和摆脱这一负担的奋进过程。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精神心理的深化。文学向人学的回归,使得文学注重表现心理过程和复杂的精神因素。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心理空间大为扩展,心理因素更为丰富,趋向于人物性格因素的多重结构。

创新与探索的活跃。新时期文学观念的自我变革和外来新思潮的涌进,推动了文学创新与探索的活跃。新时期开始以来,文学经历着一个文学观念发展、更新的过程,突破了单一创作方法的约束,为艺术思维的解放敞开了大门。朦胧诗的出现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这是文学探索的最初表现。王蒙 1979 年率先采取意识流手法,小说从以故事情节为结构核心变为以心理活动为结构核心,把作为心理辐射的大量感官印象和多层次的意识流动放在小说的前景场地上,从心理角度处理时空关系,构成一种新的小说形式。话剧则有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的创新试验。即或采取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创作,也有新的发展变化,具有传统手法与现代心理化手法相融合的趋势。1985 年以来,创新探索又具有现代手法与现代意识一体化的创作趋向出现。《你别无选择》(刘索拉)、《爸爸爸》(韩少功)、《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等作品,不只是采用黑色幽默、荒诞、魔幻的表现手法,同时也是以此作为观照表现对象意识观念,使这类作品与传统文学的距离拉得更远了。创新探索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成功与否要经过文学发展与读者接受的实践检验。但是,创新与探索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一章 诗歌创作

第一节 概述

对于六十多年来和三十多年来新诗创作及其发展道路的估价,建国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的。与那种倾向于否定、抹煞新诗成就的说法不同,应该说,新诗有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存在许多长期未获得解决的问题。它在发展,但前进中有曲折。

当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可以大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到 1976 年是第一阶段。从 1976 年底开始,当代诗歌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建国之初,诗歌创作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有一个摸索适应的阶段。因此,诗坛显得很沉寂。“虽说也有一些写诗的人,然而却零零落落,很不整齐”(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后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总起来说,从 1949 年到 1957 年这段时间里,诗歌创作的成绩和发展是明显的。其间,有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其一是,那些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走上诗坛、并已取得一定成绩的诗人,努力、同时也是十分艰苦地为表现新的生活进行探索。这涉及诗的取材、诗人的想象方式、以及诗的形象和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革新等方面

的内容。不仅从国统区来的诗人,如郭沫若、臧克家、冯至、卞之琳、袁水拍等是这样,就是来自解放区的艾青、田间、何其芳、李季、阮章竞、柯仲平、严辰、张志民等,也面临着这方面的问题,面临着适应与创新的艺术难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黑暗王朝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开始所带来的生活巨大变化,对艺术配合、服务政治的功能的强调,表现工农兵的形象和生活作为文学创作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提出,……这些,都与诗人们已经形成的艺术个性产生距离和矛盾。围绕表现新的生活而改变自己艺术个性的不协调部分,建立有新的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是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目标。但是,艺术创造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他们中的一些人依据的指导思想也并不都很正确,因此,他们的探索,虽然也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从整体上看,是处在衰退的趋势中,有的且出现严重的创作危机。这在郭沫若、冯至、臧克家、田间、袁水拍等身上都有体现。

这个时期的另一情况是,一批朝气蓬勃的新诗人的出现。他们虽然带着幼稚、不成熟的缺点,但他们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密切的联系,而似乎可以不太费力就把时代行进的脚步声带进诗中。这些诗人,后来成为当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是:已经在生活和创作上做了较充分准备的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蔡其矫,以及李瑛、公刘、邵燕祥、严阵、白桦、梁上泉、雁翼、顾工、周良沛、流沙河、孙静轩、张永枚、韩笑等。

50年代前期的诗歌创作,除了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等运动外,最主要的是歌颂祖国的新生,歌颂领导人民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党和领袖,歌颂刚刚揭开帷幕的新生活。颂歌,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潮流。臧克家的《有的人》、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严阵的《老张的手》、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邵燕祥的《到远方去》、公刘的《西盟的早晨》、《五月一日的夜晚》、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艾青的《南美洲的旅行》、《在智利的海岬上》……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

品。

诗人们对新生的祖国的歌唱,充满着自豪感和幸福感。祖国、人民的形象,已经不是闻一多所诅咒的绝望的死水、恐怖的噩梦,不是臧克家笔下“把头沉重的垂下”的老马。祖国的大地,也不再发出 30 年代艾青所刻画的响着令人颤栗的悲哀的尖声。如今,诗人们虽天真但真实地描绘他所生活的年代:“时间像童话里不老的仙女,永远这样年轻,美丽。”(何其芳《讨论宪法以后》)描绘他所走过的土地:“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冯至《西安赠徐迟》)在这个国土上,“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严阵《钟声》)。诗人何其芳,曾经在他的《夜歌》中写道:“我总是沉痛地记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总是愤愤不平地忆起我是一个中国人。”而现在,面对明亮的早晨的阳光,年青的诗人唱道:“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假如我感到自己还有什么可以骄傲,那是因为我生长在新中国的时代……”(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

这个时期,诗歌表现得充分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劳动和建设,劳动中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义,开始在新诗中得到富于诗意的展示。诗人们纷纷把他们热情的眼睛倾注到这一领域上。李季离开他熟悉热爱的三边,来到玉门油矿。阮章竞离开层层树、重重山的漳河沿,到了内蒙草原的钢城。冯至歌唱鞍钢,徐迟诗中发出钻机的轰响,戈壁舟赞颂“命令秦岭让开路”的英雄……特别是年青诗人如邵燕祥、顾工、梁上泉、傅仇、雁翼等,都以极大的热情描绘建设生活的动人图景。勘探队的井架和帐篷,开山的炮声,拂晓山谷工地的灯光,高炉上的红云,马达的轰鸣,森林般的烟囱……是这一时期诗中大量涌现的形象。

50 年代前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重要的问题。诗的题材、样式不够多样;简单地配合政治运动、中心工作的作品不少;诗人对新生活的赞颂是热情、乐观的,却不够深刻,对生活的困难和复杂矛盾一面缺乏深切把握。诗人的注意力,大都转向对外部生活情景的描绘,

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的揭示出现明显的空白。特别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少诗人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回避“自我”的加入,造成诗的艺术个性模糊的状况。某些解放前有成就的诗人,这个期间,也在走上一条艺术风格平均划一的道路。

1956年以后,诗歌创作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有了某些变化和发展。除了取材范围比以前开阔,样式比以前丰富以外,诗在表现生活矛盾的深度、在形成独特艺术个性上都有一些尝试。艾青经过多年徘徊,写了《在智利的海岬上》,标志着重新回到他30、40年代写作著名作品所确立的艺术道路上。郭小川在《致大海》和《雪与山谷》等诗中,显示了他对于思想独创性的执着追求。邵燕祥的《贾桂香》、流沙河的《草木篇》,接触到生活中的阴暗面,给予揭露和抨击。蔡其矫的《川江号子》、《雾中汉水》,把握了人民生活和情感中存在的历史负累的沉重的一面。穆旦的抒情诗,真实地揭示了处于过去与未来、感情与理智的复杂矛盾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然而,这些尝试还刚刚开始,还没有产生更大范围的突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便宣告它的结束,一大批诗人的名字,从诗坛上消失。他们是:艾青、公木、唐祈、吕剑、苏金伞、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周良沛、梁南、昌耀、孙静轩、高平……

从1958年开始,诗坛上表面很繁荣,很热闹:全民写诗,中国成为“诗国”。实际上,却是诗歌歉收的年头。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泛滥起来的“左”的思潮,文学创作上粉饰生活、为歌颂浮夸推波助澜的那种离开现实根基的“浪漫主义”的提倡,对诗歌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破坏。这两年,诗歌界的重大事件,一是新民歌的创作、搜集运动,一是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讨论。1958年春天,毛泽东同志指示要搜集民歌。接着,中国文联及各地省委纷纷发出相应的通知。这就会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民歌创作的热潮,并出版了大量的新民歌集。其中,《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编)是精选的有代表性的本子。“大跃进民歌运动”,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艺领域“左”的思潮的产物。